

# 紅軍師二師懷念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回忆红二师红四师

中共宝安县史办公室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回忆红二师红四师**

中共宝安县史办公室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广东惠东印刷厂 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210千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 7-218-00149-1/K·27

\*

定价2.00元

茲扬红军第二师之师长  
东江地区的光荣革命传统，  
为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  
服务。

彭真

## 编辑说明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我党先后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这两大起义保存下来的部分队伍分别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和第四师（通称红二、四师）。在中共东江特委领导下，这两支队伍英勇顽强、艰苦转战，为开辟和发展东江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书作为《红二、四师史料选编》的姐妹篇，共收入建国后的回忆文章33篇，资料5篇，主要领导人传略5篇，为使读者对红二、四师有一个扼要的了解，还收入红二、四师大事记一篇。由于时隔几十年，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中难免有记错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地方，为了保持文章原貌，一般不作改动，希望读者引用时注意鉴别。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本书作为一份献礼，希望能为学习、研究和宣传我党早期创建的红二、四师提供比较完整的回忆资料。这个目的倘能达到，就是最好的纪念。

本书由林华新同志负责搜集资料和编辑，在编辑过程中，得到有关单位和同志的很多帮助，谨在此表示谢意。

编 者  
一九八七年八月

## 目 录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摘录）	(1)
《聂荣臻回忆录》（摘录）	(11)
一九二七年我在海丰组织暴动的经过	黄 雍 (13)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在东江	刘立道 (20)
红二、四师在高潭	黄伟南 (26)
红二、四师进入海丰后的斗争	王克欧 (29)
一九二七年我参加东江大暴动的经过	邱 球 (35)
我所知道的红二、四师	钟贻谋 (45)
彭湃与红四师	徐向前 (74)
在红四师的日子里	程子华 (79)
忆红四师	许子威 (81)
红四师在东江	陈同生 (83)
红四师到达东江的经过	王谨权 (93)
永世难忘的经历	钟必达 (97)
回忆红四师在海陆丰的一些情况	朱道南 (102)
广州起义和东江游击	唐云青 (105)
从广州起义到参加海陆丰苏维埃	[朝] 金山 (111)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路过龙门	黄云龙 (137)
红四师经过河源的一点回忆	曾悦行 (138)
红二、四师在紫金	黄 庚等 (139)
接送红四师伤病员到中洞	刘子琴 (154)
围攻捷胜城	陈士民 (156)
摧毁封建堡垒 巩固红色政权	刘 喜 (161)

从“二八”事件到红四师受挫	煜明	(165)
葵潭之战	洪国泰	(179)
百岭、甲子战斗	刘建业	(184)
随红四师进军陆惠普	陈仲谦	(185)
在陆丰发生的战斗	陈国群	(190)
东江斗争的片断回忆	林影	(193)
一九二八年我送红军去香港的经过	赖灶鲁	(196)
二战时期东江红军后方勤务概况	陈云山	(198)
忆颜昌颐	贺培真	(203)
忆唐维烈士	唐云青	(208)
东江老根据地人民的斗争经过(摘录)		(214)
东江老根据地重点乡村惠阳县高潭乡		
中洞村的斗争经过(摘录)		(221)
我军最早的医院——中洞红军医院		(226)
我军最早的军装厂——中洞红军军装厂		(230)
我军最早的兵工厂——中洞红军兵工厂		(233)
红二师师长董朗传略		(237)
红二师党代表颜昌颐传略		(245)
红四师师长叶镛传略		(253)
红四师党代表袁裕传略		(261)
红四师委书记唐维传略		(269)
红二、四师大事记		(275)

#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摘录）

## 奔向海陆丰

离开广州后，我们一气赶到太和圩，追上了教导团的队伍，继续向花县进军。路过一个山垭口时，遇上地主民团的伏击，部队冲了过去。傍晚到花县，城里的敌人已闻风而逃。

部队在花县停了三天，整编队伍，讨论行动方针。

先清点人数，共有一千四百四十几人。共产党员占百分之一二十，主要是国民党左派，即同情共产党，反对蒋介石的人。黄埔第一期的学生不多，我是一个，还有吴展。叶镛是黄埔第三期的。教导团的队长、党代表大多是黄埔第四期的，其余均系武汉军校的学员。

部队编为一个师。叶镛当师长，袁裕（国平）当党代表，师党委书记唐澍，政治部主任王侃如。在一所学校里，大家开会研究，如何给这支部队命名。红一师有了，是朱德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的部队；红二师有了，是海陆丰一带的另一支南昌起义部队；红三师也有了，是琼崖游击队改编的。最后，大家确定我们叫红四师，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红四师下属三个团：十、十一、十二团。我任十团党代表。还有一、二十个女同志，都分在师部、团部工作。我们团管军需的那位女同志叫彭镜秋，现在还健在。组织成立后，我把从起义指挥部拿来的银毫子全部交公。部队是仓促撤出的，经费十分困难。

部队下一步到哪里去？花县离广州太近，又靠铁路线，

肯定不能蹲。有的主张去北面的韶关，有的主张去海陆丰。听说朱德同志的队伍在韶关一带活动，多数人主张去同他们会合。于是，派人去联络。

部队在花县，每天都有地主民团来攻，师里要我负责指挥打民团。那些地主民团滑得很，一天来攻好几次。我们要是不理他，就呼噜呼噜地来一片，噼噼啪啪乱打枪；我们要是一打，他们就跑。有时我们正吃着饭，民团来了，部队扔下饭碗就去打；刚打走他们，一会又来了，又得去打。他们熟悉地形，零敲碎打，跑得又快。我们有时也追击一下，但追得不太远，怕中埋伏。我们把打民团的战术，叫做“打狗战术”。意思是别看它来势汹汹，你抄起棍子去打，他们就夹着尾巴逃跑了。

师部三次派人去韶关，都没找到朱德同志的队伍。第三天晚上，才决定去海陆丰，会合红二师。次日一大早出发，走了半个多月，经从化、良口、龙门、杭子坦，绕道蓝口附近渡东江，南下进入罗浮山脉东侧的紫金县境。途中，有些民团怕我们，在村边插着木牌，写上“欢迎来境，欢送过境”的大字，我们就交代政策，分化敌人，遇上反动民团的袭扰、顽抗，则狠狠地打，绝不留情。广东是大革命的发源地，群众痛恨军阀，心向革命。我军每到一地，都受到群众的热情接待和支援，对士气鼓舞很大。

紫金县城敌军不多，县长叫丘国忠，是个国民党军队的少将，极其反动。起义军撤出广州后，他坐卧不宁，屡电广州反动政府，求援增兵。当我军进入县城附近的黄花村时，丘逆误认为是广州来的援兵，派人出城联络。我们决定将计就计，冒充“援兵”进城。那天上午，我军队列整齐，开赴县城；丘国忠带着县府的大小官员来到城外，恭身欢迎。我们

不费一枪一弹，将他们活捉，占领了紫金县城。丘国忠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经群众公审后枪决。

一九二八年元旦，红四师抵海丰县城，受到中共东江特委和当地群众的热情欢迎和慰问。海丰是我党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地，彭湃同志的故乡。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彭湃先后在这带发动过三次农民起义，影响甚大。第三次起义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底，数千农民在董朗、颜昌颐领导的红二师（共一千余人，也是南昌起义的部队）的配合下，一举攻占了海丰、陆丰两县城，正式成立苏维埃政府，实行土地革命。我们进抵海丰县境后，见各村的墙壁上写着许多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处处红旗招展，颇有革命气势。县城的墙壁，都用红土刷过，全城一片红，真是“赤化”了的天下。群众听说我们是广州下来的红军，热情万分，家家让房子，烧水做饭，象亲人久别重逢一样。

为欢迎红四师，东江特委在县城广场上召开了万多人的群众大会。特委书记彭湃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广州起义失败了不算什么，革命难免有挫折，有失败，失败了再干，革命一定会胜利。二是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要坚决消灭地主军阀，保护穷人利益。什么是共产党的法律？抓住地主杀他们的头，就是共产党的法律！他的富于鼓动性的讲话，博得了一阵阵的热烈掌声。接着，红二师和红四师又胜利会合。从此，这两支年青的红军队伍在东江特委的领导下，并肩战斗，揭开了东江游击战争的新篇章。

### 坚持东江游击战争

红二、四师会合后，海陆丰地区的革命力量，进一步增

强，群众斗争情绪高涨，形势不错。东江特委决定“迅速扩大红区”，由红二师北向紫金、五华地区发展，红四师东向普宁、惠来地区发展，以便控制西起东江、东至潮汕、北起梅南、南至沿海的大片区域。

这时我已调任红四师参谋长。部队在海丰城里住了三天，即奉令东进。我每天都找很多人谈话，了解敌情、地形、道路。当参谋长，不把情况搞清楚是没法打仗的。部队先到陆丰，那里的反动派已跑光，不战而克。接下来打甲子港。这一仗打得比较厉害。防守的地主民团依托土工事顽抗。不过，他们的装备不行，扔的炸弹是土造的，炸开来很响，里面多是碎玻璃，杀伤力不大。我们强攻了几次，很快解决了战斗。继而攻打果陇。这个村庄是硬钉子，防守的是华侨武装民团，武器弹药不少。我们令十团担任主攻任务，十一团、十二团助攻，打了三天，牺牲了二三十个同志才攻下来，从而使陆丰和普宁连成了一片。战斗中师党委书记唐澍不幸牺牲，有颗子弹打进他的肚子，血流在里面致命的，身上一点血迹也没有。他是四川人，黄埔学生，工作勤勤恳恳，平易近人，是个好同志。我们一路下去，尽是和民团打来打去，几乎天天有仗打。这时，国民党的“进剿”就来临了。二月下旬，敌人从广州派出两个军的兵力，加上军舰控制海面，从西、北、南三面围攻海丰，彭湃同志组织当地军民奋起反击。因事前对敌人的“进剿”缺乏必要准备，敌众我寡，守了几天，顶不住了，被迫于月底退出了该城。

那边丢了海丰，这边就去打惠来。惠来城里是陈铭枢的杂牌部队，从福建来的。攻城前，我们叫人喊话：“我们都是穷人，要分土地呀！”“穷人不打穷人，你们放下武器吧！”还放风筝，撒传单。当时红军还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那

套政治工作，但也有小的发明创造——战场宣传，瓦解敌军，多少起了点作用。敌人受了影响，既不打枪，也不交枪。

围了几天后，彭湃同志和他爱人都来了。他爱人姓许，也是共产党员，怀里还抱着个吃奶的孩子。彭湃同志急着拿下惠来，要领着人去爬城楼。他爱人也要把孩子扔下，和他一起去。这样太危险，我们不同意。组织队伍强攻了一下，打死敌军一个团长，敌人就跑了。

“进剿”的敌人继续压过来，我们在惠来城呆不下去了，便转移到普宁山区的三坑。彭湃和特委的同志也来到这里。我们是在平原蹲不住才进山里来的，敌众我寡，不进山就不能保存现有力量。但特委不同意，提出了“反对上山主义”的口号，非要把部队拉下山去同敌人硬拼不可。我们说这样干要吃亏，不能去。彭湃同志气得不得了，自己带头往山下冲。他去冲，我们也得跟去，好保护他，把他接回来。我们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去和敌人硬干是不行的。

敌人的围攻一天天紧迫，我们的处境一天天困难。部队有耗无补，越打越少。红二师、四师各剩下五、六百人，另外有个潮阳独立团几十人枪，就那么点力量。那时地方党不晓得建设和加强主力红军。地方主义、宗派思想比较严重。外来的红军是一摊，本乡本土的地方武装是一摊，泾渭分明，并水不犯河水。红军打一个少一个，没有补充来源。人牺牲后，枪就被拿到地方上去武装赤卫队。红军越打越少，越打越弱，地方武装当然也发展不起来。

处境越来越困难，怎么办？五月间，特委召开会议讨论行动方针，红二师、四师的领导同志都出席了会议。我们和二师的领导都认为，这个地方南面靠海，东临平原，山也不

大，机动余地小，再呆下去不是办法。应当把二、四师的千把人集中起来，拉到粤赣边界去打游击。那里是两省交界的地方，山多山大，有较充分的活动余地，不容易被敌人消灭掉；待看准机会就咬敌人一口，能慢慢地补充和发展自己。这个意见，现在看来是对的。当时我们虽不懂得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但从军事上考虑到了不能和敌人硬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然而，特委的同志不同意，说是广东各地的地主民团很厉害，走不过去，要部队回到海丰去。我们都是外乡佬，不了解情况，不便再坚持意见，就按特委的决定办。会后，彭湃、袁国平、颜昌颐等同志到上海去了。

在和彭湃相处的日子里，他给我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从前，我只听说过他的名字，来到东江后朝夕相处，才真正了解他。他出身富豪家庭，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当过海丰县的教育局长。他很早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农民运动，带头革了地主家庭的命，把土地分给农民，在海丰领导成立了广东省的第一个农民协会，是我党早期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海陆丰地区的贫苦农民，十分感激和拥戴他，称他为“彭菩萨”。彭湃是个革命意志很坚强的人，又是能和当地的农民群众真正打成一片的人。不论环境多么艰难困苦，他总是充满乐观的、必胜的信念。他常说：失败了再干，跌倒了再爬起来！在共产党人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他个头不高，身着普通农民的衣服，脚穿草鞋，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和群众谈心、交朋友，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象一家人似的。在农民家里吃饭，饭碗上沾着鸡屎，他毫不在乎，端起碗来就吃。这一点的確是难能可贵的，我很佩服他。彭湃也有弱点，主观、急躁，有时“左”一些。这同革

命初期经验不足有很大关系。彭湃走后，我们都很怀念他。后来，他和杨殷同志在上海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

彭湃等同志离开东江后，红二、四师根据特委决定，一道回去攻打海丰。特委同志说，城里有内应，攻克不成问题。其实守敌是一个多团，仅八个士兵是我们的人。我军攻进城里，占领了小部分地方，再啃就啃不下去。没有办法，我们带上那八个士兵，退出城来，又转到海丰附近的山里去。

敌军整天搜山、放火、杀害群众，我们的处境日趋艰难，只好分散游击。人越搞越少，有的是战斗中牺牲的，有的是被敌人抓住杀掉的，有的是病死的，有的是负伤没药治疗死去的，有的是活活饿死的，有的是被山洪爆发卷走的……。没有粮食吃，靠挖野菜度日，红薯叶子算是上等食品，稀罕得很；没有房子住，临时搭个草棚避避风雨，后来因怕暴露目标，连草棚子也不搭，净住树林、草堆；蚊虫极多，害病的同志不少，又没有药治；整天和敌人周旋，他们来东山，我们上西山，他们来西山，我们又转回东山，一些病号走慢了就被敌人捉去。我在一次战斗中腿部负了伤，天气炎热，伤口化脓，多亏医生采了些中草药敷上，过了个把月，伤口才愈合。六月中旬，叶镛同志因患严重疟疾，不能行走，隐蔽在一个地方，被敌人搜出杀害。他是四川人，黄埔第三期毕业后，任过武汉中央独立师和第四军教导团的连长、营长，为人正直，作战勇敢，对东江游击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遇害时年仅二十几岁。此后，由我任红四师师长，带着一、二百人继续坚持斗争。敌人“搜剿”一次，我们的人损失一些，实在想不出好办法，摆脱被动的、有耗无补的局面。

七、八月间，中共广东省委派陈郁同志来了解情况。他感慨地说：“省委的同志只知道你们处境艰难，想不到难到这个地步！”他传达了省委对形势的分析，认为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分批转移，保存力量乃是唯一出路。到年底，只剩下了我们几十个人。

一九二九年一月，广东省委决定将最后这批人撤走，东江游击战争遂告一段落。

回顾这段历史，我觉得教训是深刻的。主要是：第一，在对形势估计上，只看到海陆丰地区的局部“高潮”，而忽略了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总特点。那个时候动不动就讲“高潮”、“进攻”，说什么敌人“溃不成军”、“临死还要踢破三床草席”，盲目性很大。因而，对于军阀势力的联合进攻及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应有准备。敌人的“进剿”来临，步步被动，束手无策。第二，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仍是夺取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作祟，未树立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所谓“反对上山主义”，反对去粤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便是证明。第三，在军队建设上，没有正确解决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搞根据地，搞游击战，一定要有核心力量。核心就是主力部队。只有不断加强主力部队的建设，使之与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有机结合，才能战胜敌人，发展根据地。而特委的方针却与此相反，失败的命运当然是不可避免的。第四，在游击战的战术上，不懂得避强击弱，有进有退，有游有击，而是硬碰硬，搞拼命主义。“以卵击石”，焉有成功之理！总之，那个时候我们党还缺乏武装斗争经验，出现这些问题并不奇怪。我也是“事后诸葛亮”，提出这几点看法。从中，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思想，是

多么正确而伟大。

## 离开东江之后

一九二九年一月，我们接到中共广东省委的通知，要把剩下的一批同志，通通转移出去。

省委布置的转移路线是经惠州去九龙，并给每个同志发了路费。我们共有二十几个人，从海丰附近莲花山的热水洞出发，沿着小路爬山越岭，翻过一座大山，抵惠州地区。那里有位农民党员来接头，领我们去他家吃了顿饭，而后将我们送上公路，他便回去了。因这批人集中行动，目标太大，我和党代表刘校阁商量，决定分两路走。他带一路，我带一路，到九龙再会合。分手后，他们就奔惠州城里去了。

我领着十来个人，在惠州城外的野地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分成几批行动，从惠州乘汽车去樟木头，再转乘火车去九龙的接头地点会合。途中，我们这一路的同志没遇上什么麻烦，陆续到达九龙。但刘校阁那一路人，却杳无音讯。我后来也没打听到他们的下落，估计是被敌人抓住杀掉了。那时同志们刚从山里出来，个个面黄肌瘦，胡子拉碴的，脚上又穿着海丰的草鞋，人家一看就会怀疑是从“赤化”地区来的，容易暴露目标。

在九龙，我们住在一座小楼里，单门独院，比较安全。这是广东省委租的一所房子，等于个招待所，有位工人同志负责照顾我们。刚到的那几天，大家饭可没少吃，但总觉得肚子填不饱，这大概是在山里长期挨饿造成的吧。

九龙是英租界，国民党不能进来乱抓人。然而，英帝国主义毕竟和国民党一个鼻孔出气，所以我们也保持警惕，不暴露身份，不随便上街。“交通”告诉我们应付敌人搜查的办

法，并再三叮嘱大家：如果万一被捕，要想办法去澳门，绝不能去广州。在澳门，组织上可以营救；去广州落到国民党手里，就难办了。

我们在九龙住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主要是学习“六大”文件。文件用《牡丹亭》之类的小说封面伪装着，是铅印的。这是我第一次有时间坐下来，安安静静地阅读党的决议。

“六大”的决议，写得很好，读起来很解渴。例如，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关于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的论断，关于既要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又要反对“左”倾盲动主义的问题，关于建立工农红军和发展根据地的任务，等等，都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特别是联系到大革命失败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军事斗争，离不开正确政治路线和策略的指导。否则，将一事无成。

三月间，“交通”通知我们去上海。同行的有我和桂步蟾、王和峰、周棺仁等六个同志。到了上海，先是住在我过去住过的黄埔江边的泰安客栈里。过了不几天，我们在法租界的金神父路租了个亭子间。每月十三元的房租，自己烧饭做菜，听候分配。

不久，王和峰、周棺仁等四人被分配去湘鄂西根据地，我和桂步蟾同志则去大别山区工作，踏上了新的征途。

（摘自《历史的回顾》第56页至第6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文中师党委书记唐澍应为唐维之笔误，叶镛是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应为第四期毕业之笔误——编者注）